

近代日本的中國史研究

——以時代區分論爲中心

邱添生

一、前言

日本是亞洲東緣的島國，又爲中國東方的鄰邦，自古以來即深受中國文化的薰陶，其歷史發展一直與中國息息相關，正因爲如此特殊的環境與背景，日本學界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向來極爲重視。到了近代，儘管因其推動「明治維新」而實行西化改革，廣泛攝取歐美近代文明，但卻仍然沒有忘懷本身傳統文化的深厚根源，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鑽研熱誠遂亦迄未稍減，因而累積了相當豐富可觀的研究業績，其中更有不少值得吾人借鏡參考的卓越成果，基於學術文化交流的觀點，實不容忽視而有加以正確瞭解的必要。

大約十餘年前，筆者應邀參加師大歷史學會舉辦的一項學術座談會，當時曾向歷史系同學報告日本學界對中國史的研究，由於是隨意淺談的性質，所以僅能就其研究重心和發展趨勢，略分幾個階段加以概括的說明，並簡單介紹若干種相關的學術性刊物，實未及作較具體而深入的論述（註一）。

本文撰述動機與要旨，實緣筆者自一九八八年至八九年間，滯留日本京都大學研究進修之際，曾經數度聆聽谷川道雄教授關於此項課題之講述，爰將其基本架構與內容加以整理，擬就近代以來日本學界對中國史的研究歷程，試作較有系統的專門性論述，同時對於其中主要課題之一的時代區分論，特將其學說之形成以及諸學派間的論爭要義，詳加申論分析。冀望藉此探討與轉介，能使國內學界對於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實況，獲致較爲客觀且深刻的理解，進而也得以廣收切磋參酌

的效果。

二、東洋史學的成立及其演進

論及近代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爲了系統說明其發展的歷程起見，實有必要先行敘述與此相關的一項課題，那便是東洋史學的成立及其演進。

自古以來，由於日本長期受到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並且獲致難以估計的恩惠，因而往往把有關中國史的知識，作爲其國民必備教養的一部分，尤其知識分子更都喜歡閱讀各種中國史籍。因此，諸如正史等各類中國史書的解說和出版，向來在日本國內極爲盛行，甚至在現今中國本土已經失傳而無法見到的珍貴版本，卻反而在日本留存的實例也不少（註二）。同時，歷來日本學者也不乏關於中國史上各種制度的研究，直至今日，其成果仍頗有助於中國學者的相關研究。

不過，大致說來，日本在明治時代（西元一八六八年—一九一二年）以前，其有關中國史方面的知識與研究，仍只是屬於漢學（或稱中國學）的一環而已。所謂「漢學」，乃是日本統治階級必備教養的一門學問，而且中國傳統的儒學和文學也都包含其中。蓋日本自七世紀成立統一國家以來，其統治階級率皆閱讀中國的詩詞與文章，並且自身也都能詩能文，例如奈良時代（七一〇—七九四年）以及平安時代（七九四—一八五五年）的貴族階級，便都能夠熟讀「史記」、「漢書」、「文選」、「白氏文集」等書。到了鎌倉時代（一一八五—一三三三年）以後，漢學的主要肩負者，則是佛教寺院特別是禪宗的僧侶們，其中便有所謂「五山文學」（註三）；這些禪僧學習宋明以來中國的學問、宗教以及其他的文化，然後再將其學習成果傳播給一般民衆，於是又有當時所謂「抄物」（註四）的中國古典講義錄留存下來。

如是，日本古代的貴族階級，中世的佛寺禪僧，都是漢學的肩負者；然而，到了近世的江戶時代（一六〇三—一八六七年），學問則普及於武士階級之間。因爲在這個時代裡，大約自十七世紀中期以後，直到十九世紀中期爲止的兩百餘年期間，日本對外實行鎖國政策，國內也幾乎沒有戰爭，可說是極其和平的時代，所謂的武士階級，雖然在形式上是武士，但在實質上卻是以文官性質而侍奉幕府或大名，並從事行政事務的工作，儘管他們強自警惕勿忘武士的精神，而在另一方

面，卻又認為必須學習漢學尤其是朱子學，作為自身的教養，當時為了出仕任官，這種教養被認為是十分必要的條件。

到了明治時代，隨著日本近代國家的確立，以往作為統治階級之教養的學問內容遂產生了變化，其有關中國史的知識，也已不再是包含於漢學中的一部分，卻逐漸發展而成為一門近代歷史學，以下試擬詳述其形成以及演進的過程。

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東京大學正式成立，九年後易名為帝國大學（註五），其中設有文科大學，即今之文學部。當時在文科大學中雖設置了史學科，卻沒有所謂東洋史或日本史，只是延聘了德籍教授里斯（Ludwig Riess, 1861-1928）（註六）前來，專門講授西洋史，蓋因當時大學教育的首要任務，便是學習西歐的學問。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史學科中追加了國史學科，而在此國史學科中設置了「支那歷史」的科目。但是，若說在此以前沒有關於中國史的講授，卻也並不盡然，因為除了史學科之外，尚有所謂「漢學科」，乃係由經學、史學、文學所構成的學科；換句話說，中國史仍是屬於漢學的一部分，這是繼承了前述明治時代以前之漢學的性質，也就是作為統治階級必備教養之一環的中國史。於是，此時便由這種性質的中國史，逐漸蛻變為近代歷史學之一的中國史。

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日本學制有所改革，在原来的史學科中，分別設置了國史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等三個領域，此時開始正式使用「東洋史學」的名稱，而中國史便包含在東洋史學之中（註七）。直到今天，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日本國內的各大學，也都仍然使用這種畫分法。

東洋史究竟是一種怎麼樣的概念？其實，所謂東洋史學的學問領域，可說是因應當時國家的要求而產生，因為這個名稱最初是從中等學校歷史教育的問題衍生出來的。一八九四年（明治二十七年），學界曾為了有關中等學校的歷史教育問題發生爭論，當時，那珂通世倡議把中等學校的外國史課程，畫分為東洋史和西洋史，結果這項建議被文部省（相當於我國的教育部）採納，於是首度出現「東洋史」的名稱。根據那珂氏的主張，認為東洋的歷史是與西洋的歷史相對地而成為世界歷史的另一半，又依照他的觀念，東洋史的講授內容，乃是敘述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諸國治亂興亡的大勢（註八）。

如是，所謂東洋史的領域，雖然是從中等學校的歷史教育衍生出來，但是其中含有一項觀念，認為世界歷史是由東洋歷史與西洋歷史所構成的，就某種意義來說，同是屬於東洋人的日本人，似乎有意把東洋向前面推擠而突顯出來。明治中期的日本人產生如此觀念的背景，在於日本已經以近代國家的形態而成長，當十九世紀後半，歐美列強正瘋狂地向亞洲進

行侵略時，日本也以近代國家的一員而參加角逐，爲此之故，他們認爲有必要以異於過去傳統觀念的看法來瞭解亞洲各國，同時也必須以新的近代的方法來研究亞洲各國。

東京大學創設東洋史學科時，其首任教授爲白鳥庫吉。他是利斯所指導的第一期學生，於大學畢業之後，曾被聘請擔任學習院的教授，負責講授日本史以及西洋史之外新加的東洋史課程。學習院是專爲皇族與華族（註九）子弟而設立的學校，或許也是由於當時確有必要傳授東洋史知識的緣故，所以延聘白鳥氏前往任教。白鳥氏也在此時開始研究朝鮮、西域等地區的歷史，他以撰著『西域史研究』而聞名，同時又有關於漢代朝鮮四郡的研究，另在中國上古史方面也有許多研究成果（註一〇）。

白鳥庫吉是近代日本之東洋史學的掌旗人物，或許是深受所謂德國正統史學注重史料批判的影響，他對於傳統中國史的看法是極富批判性的。一九〇九年（明治四十二年），白鳥氏發表「支那古傳説の研究」的論文，認爲堯、舜、禹並非實際存在的人物，而是把漢民族的理想予以人格化的傳說人物。他這種見解，遭到當時學者的強烈批判，稱之爲「堯舜抹殺論」，其中又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林泰輔的批判最爲激烈。林氏是「支那上代の研究」、「周公とその時代」等書的著者，他曾數度批判白鳥氏的論點，爲此還特別動員了當時剛發見不久的甲骨文，他主張甲骨文是殷商王室所使用的卜骨文字，這是日本學者最早的甲骨文研究，他對甲骨文的正確理解，甚或不亞於劉鐵雲、羅振玉等中國學者。林氏可說是一位重視傳統的學者，因而確信夏商周三代的實際存在，也就是所謂釋古派；與此相對地，白鳥氏則是所謂疑古派。釋古派與疑古派的論爭，在中國學界也曾透過『古史辨』等著書而展開，但那是一九三〇年代的事，而日本方面卻似早在其前二十年就已進行了。無論如何，這可看作是歷史學近代化過程中興起的共同現象。

白鳥庫吉的研究，雖然以今日的觀點來看確有許多缺陷，但卻可說是對於傳統歷史學的一項戰鬥性挑戰。他的研究方法，是從利斯學來的歐洲式歷史學，也就是所謂德國正統史學，期以嚴厲的史料批判來破除傳統的觀念。如此的歷史學近代化，是以日本近代國家的形成爲背景而產生的，在這種時代環境下形成的日本的東洋史學，另一方面也變成是爲帝國主義而效勞的結果。例如，『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全十六冊，係收集有關滿洲、朝鮮地理與歷史之調查研究報告的著書，是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委託白鳥庫吉等學者進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最初刊行『滿洲歷史地理』

和『朝鮮歷史地理』各二冊，而其延續事業便是刊行這項研究報告。其研究水準極高，而且對於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的研究確實大有貢獻，但是，其係爲了配合日本帝國主義之要求而編纂刊行的著書，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其次，關於臺灣方面，也由臺灣總督府編纂了『清國行政法』全六卷，這是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於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六年）委託織田萬、狩野直喜等編纂的著書，並且獲得淺井虎夫、東川德治、加藤繁等的協助編纂，其目的是爲了統治臺灣，因而有必要研究中國清朝之行政方法的緣故。雖然這套著書也有極高的學術水準，即使直至今日仍然具有利用價值，但是究其實際，依然是爲了配合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之要求而完成的著書。關於這些參與編纂的人物，不妨分別試加簡介：織田萬是當時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狩野直喜是後來京都帝大文學部的中國哲學、中國文學教授，也是該校文科大學的創立者之一；淺井虎夫畢業於東京帝大漢學科，是福岡高等學校教授，撰有『支那ニ於ケル法典編纂ノ沿革』的著名；東川德治是『中國法制大辭典（一名典海）』的著者；加藤繁後來成爲東京帝大的東洋史教授，著有『支那經濟史考證』上、下兩卷等書。於此附帶說明一下：『清國行政法』的編纂事宜，是由當時設在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內所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組織負責進行的，這個調查會的成立，係由於後藤新平統治臺灣之際，認爲硬將日本的法律全盤搬進臺灣實施並不恰當，而應該對於臺灣原有的舊慣制度，妥善進行科學的調查，然後配合其實際情況來執行統治措施，因而才有該套著書的編纂。

如前所述，日本的東洋史學，當初是以日本近代國家的對外政策爲現實要求而誕生，並以歐洲式的史料批判爲學問的研究方法而展開。然而，較諸東京大學稍晚而於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創立的京都大學（當時稱爲京都帝國大學），卻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學風。蓋因東京大學與政府當局密切結合，頗有成爲官吏養成機關的傾向，以致阻礙了學術的自由發展；爰是之故，京都大學自創立伊始，即有鑒於此，乃以建設一座新的純學術研究之府爲目標，嚴守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原則，強調自由主義的學風。一九〇六年（明治三十九年），京大設置了文學部（當時稱爲文科大學），內藤湖南先生被延聘爲東洋史學的首任教授。內藤氏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並未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但出生於儒學世家，曾任「大阪朝日新聞」記者，活躍於新聞界而擅長撰寫政治問題的評論，尤其對於中國學問的造詣與見識，更被譽爲當代權威的第一人（註一一）。就以延聘在野知識分子任教這一點而言，也可以看出當時京都大學所秉持的自由學風。接著，東大

出身的桑原鷲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也相繼以教授或助教授的身分前來任教，他們共同建立了京大東洋史學的輝煌傳統，而其門生弟子之中也出現了許多俊秀之材。桑原氏在東西交涉史，矢野氏在中國近代政治史，羽田氏在北亞、中亞史等方面，各都分別留下畫時代的研究業績，例如桑原氏有『宋末の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の事蹟』、『東洋史說苑』、『東西交通史論叢』、『東洋文明史論叢』、『支那法制史論叢』等著書（註一二），而矢野氏的『近世支那外交史』、羽田氏的『西域文明史概論』等，也都是享譽學界的史學名著。

三、內藤湖南的史學及其時代區分論

前面曾經提到好幾位京都大學的學者，但是對於形成京大東洋史之學風貢獻最大的，仍應首推內藤湖南先生（一八六六—一九三四）。內藤氏精通中國史，他的研究幾乎涵蓋自古代至近世所有時代的史事，其對於各種文獻的理解，充分顯示具有卓越的見識，他與羅振玉、王國維等近代中國學者都有深厚的摯交友情，對於甲骨文字、敦煌文獻等新出土史料也有積極的濃厚興趣，並且曾經遊歷中國，調查東北的奉天故宮，發見了「滿文老檔」、「五體清文鑑」等珍貴文獻，因而使日本的滿洲史研究展開了新的階段。他又善於書法，其作品被譽為近代日本的著名墨寶之一，此外，他還精通文學、繪畫、日本文化史等，對於各類的時事問題，也曾發表過許多深具洞察力的權威性見解（註一三）。

內藤湖南在廣泛學術研究所締造多采多姿的卓越業績，直至今日仍絲毫沒有喪失生命活力，其中給與後世研究者絕大影響的，便是中國史的時代區分論。過去一般學者探討中國史的發展，往往都以唐宋或明清等朝代的興亡來區分時代，內藤氏認為這樣在歷史學上並不正確，而應該以其構成各個時代的實質歷史內容來區分。基於這種觀念，他把中國歷史特別是自唐至宋的發展過程，賦予如次的體系（註一四）：

綜觀中國自唐至宋的歷史發展過程，可以發見逐漸從貴族政治（或稱世族政治）轉向君主獨裁政治而發生的重大變化，雖然早在周代（封建制度）或漢代（外戚制度）也曾施行過類似的貴族政治，卻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最為盛行。魏晉南北朝時代的貴族階級，是歷經幾代出仕任官的世家，而以望族的身分在地方擴張勢力，即使皇帝也無法左右這種門閥的

地位，毋寧說皇帝似乎是代表貴族階級之共有物的狀態，相對地，一般人民則是類似整體貴族之奴隸的存在。隋、唐兩朝皆曾有意以科舉制及府兵制的力量來改變門閥主義，但卻都無法徹底達成。真正把貴族勢力從根本打倒的，乃是中唐以後的節度使以及其後唐末的叛亂，蓋於節度使軍隊以及唐末的叛亂勢力中，都由人民掌握了權力，因而使貴族階級漸趨沒落的衰頹。一旦貴族階級沒落衰頹之後，皇帝便得以擺脫貴族集團的掣肘，直接統治人民，於是自宋代以後盛行君主獨裁政治；而人民的參與政治，較諸貴族政治的時代又向前邁進一步，例如胥吏得在行政系統的末端鞏固其地盤，便是象徵這種傾向的結果。另外，若從經濟上的層面來說，所謂兩稅法的實施，就是保障了人民的土地所有和居住的自由。如是，人民地位的提昇，便是唐代中葉以後中國史發展的趨勢，爾後更由於辛亥革命而排除帝制轉向共和，便可以看作是歷史的必然性。

內藤氏也就是基於這樣的觀點，他反對辛亥革命之後不久出現的帝制復活運動，並表示強烈支持共和政體（註一五）。

內藤氏對中國史的發展提出了以上的看法，但又認為這種發展並非只在漢民族的世界中進行，而是藉著與四周諸民族的相互關係而推進的。換句話說，漢民族的高度文化向四周波及之後，逐漸促進鄰近諸民族的自覺，致其勢力又形成反作用而影響到中國內地，於是中原本部與四周邊緣的這種激盪互動作用，使得中國文化在東亞的規模，不斷擴充其影響的範圍，同時還生氣蓬勃地持續到十九世紀為止。基於這樣的歷史發展觀點，內藤氏把中國史作了如次的時代分期：

第Ⅰ期 自天地開闢至東漢中葉，稱為「上古」。是中國文化向外部發展的時代。

第一過渡期——自東漢後半至西晉。這段期間是中國文化向外部的发展暫時停止的時代。

第Ⅱ期 自五胡十六國至唐代中葉，稱為「中世」。是由於外部種族的自覺而使其勢力反彈到中國內部的時代。

第二過渡期——自唐末至五代。這段期間是來自外部之勢力在中國達到頂峰的時代。

第Ⅲ期 宋元時代，稱為「近世前期」。

第Ⅳ期 明清時代，稱為「近世後期」。

以上各期，若從前述貴族政治與君主獨裁政治的消長來說，第Ⅰ期（上古）——前期貴族政治，第Ⅱ期（中世）——後期貴族政治，第Ⅲ、Ⅳ期（近世）——君主獨裁政治。如是，又可以看作是「上古」、「中世」、「近世」三個段落的區分法，而在各段落中間則分別設有「過渡期」。這種時代區分論，並非僅只是歷史的架構而已，乃是從政治、經濟、文學、藝術、

哲學、思想等整體文化史來綜合觀察的一大體系，藉此可以略窺內藤氏所倡說的文化史觀，也是所謂「內藤史學」的中心（註一六）。

內藤氏的時代區分論，無疑地是基於他所獨創的史觀，不過，他這種見解的孕育形成，其實也充分吸收了趙翼、王鳴盛等清代考證學者之學問的特色。他不是像白鳥庫吉那樣根據歐美式的近代實證主義，一味從外部來批判中國史，反而是繼承了中國的傳統學問，特別是清代考證學的成果，運用疑古與釋古的兩種方法，冀從內部來掌握中國史的發展過程。爰是之故，一般日本人或歐美人士往往以其本國的歷史作為標準，而把中國史的發展看成是不合乎演進規則，亦即視為反常的現象；可是，內藤氏卻反對這種看法，他認為只有中國史才是循著最自然、最正常的規則而發展的。

固然，類此認定中國文化是世界各種文化中最高水準文化之一者，並不僅是內藤湖南而已，事實上，當時任職京都大學文學部，負責講授東洋史、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的教授們，幾乎都具有這種共識的傾向。當二十世紀初年，適值日本的近代化正在進行、歐化愈益加深的情況下，此等學者卻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給與高度評價，並進而從其文化內涵中鉤尋出一種人文主義(humanism)的本質，他們從事的中國研究，並非純以儒教為軸心的所謂「漢學」，而是要以客觀的態度，確實掌握住中國文化自封建思想脫離後所呈現的各個本相。就這項意義而言，他們的學問實已具備了相當近代性的特質。於是，這些京大文學部的學者們，超越了歷史、哲學、文學等專門領域，彼此密切交流，並於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組織「京都大學支那學會」，不久，他們早期的學生小島祐馬、本田成之、青木正兒等，開始刊行「支那學」的研究雜誌，因而被稱為「京都支那學派」，其中心領導人物之一，便是以撰著「中國哲學史」一書而聞名的狩野直喜，而後來研究中國文學的著名學者吉川幸次郎，便是他的門下弟子。

如上所述，內藤湖南在學術上的影響，確已超越一般所謂「漢學」的領域，而更及於全盤的歷史學。他的學問，也就是所謂「內藤史學」，雖然強烈地帶有近代性的特質，但卻不是以歐美式的基準而從外部來批判中國社會的演進方式，反而是徹底從中國史本身的內部來鉤尋其發展的脈絡。正由於這些卓越的獨特見解，致使其身歿之後歷經半個世紀以至於今日，他的學問仍然能夠生氣蓬勃地保存下來；同時，也正因為這個緣故，才促使京都大學的中國史研究直至今日仍然得以持續發展，並充分顯示其獨具的特色（註一七）。

四、兩次大戰間的中國史研究趨勢

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契機，促使世界的精神層面狀況產生了重大變化，整個世界對於社會、經濟乃至民衆生活等，似乎都寄與特別強烈的關心。當然，在這種時代思想背景之下，歷史學的發展勢必受到影響，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自也不能例外。譬如在東大方面，加藤繁便推展了有關中國經濟史的開拓性研究，給與學界相當重大的影響，其研究業績的結晶是『支那經濟史概說』、『支那經濟史考證上卷、下卷』等書。此外，又如東大出身的玉井是博著『支那社會經濟史研究』、京大出身的岡崎文夫著『南北朝に於ける社會經濟制度』等有關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以及京大教授那波利貞關於唐代之庶民社會史的諸研究（註一八）等等，也都可以說是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研究趨勢。同時，那波氏曾經留學法、英、德等國，又是以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蒐集品為中心而進行敦煌文獻研究的一位先驅者。

一九二〇年代後半以後，馬克斯主義的思想逐漸普及，而另一方面，日本資本主義的危機愈益加深，其侵略中國的活動更趨於明朗化，於是從所謂「講壇歷史學」的內部，要求史學革新的呼聲高漲起來。在東京方面，以東大出身的年輕研究者為中心，於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創立了「歷史學研究會」，並於翌年創刊雜誌『歷史學研究』，其宗旨在於批判以往之歷史學脫離了現代世界進展的潮流，並且指摘過去之歷史學研究對於民衆的利害漠不關心；基於如此不合理現狀的認知，於是包括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等各個領域的一批研究者，彼此共同協力，希望創建一門具有活性且又合乎科學的歷史學。自該雜誌刊行之後，陸續收載了許多有關社會史、經濟史研究的論文，並且致力於內外學界的介紹與批判，其中對於當時中國學界正在盛行的社會史論戰也曾加以介紹。

至於在京大東洋史研究室方面，也由大學畢業後繼續在大學院（即等於中國的大學研究所）深造的年輕研究者為中心，組織了「東洋史研究會」，並於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十月開始發行學術性雜誌『東洋史研究』，自創刊號起，每卷六號（期），後來改為每卷四號。該雜誌的宗旨，在於致力各種有關東洋史研究論著的發表，以及學界動態的批評與介紹，並藉此探索東洋史研究的展望及其邁向將來的前進之途。這種研究趨勢，乃是期望學問得以超越個人興趣的領域，而能夠

在整體學界的關聯中進行，因而可說是以學問的社會化爲目標，同時從另一方面的意義而言，也是對以往所謂「支那學」這門學問的批判。東洋史研究會又在學問內容方面，標示了一個新的方向，從當時『東洋史研究』整體收載的論文都傾向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這一點也可以大致看出。另外，也有一項值得注意的現象，即該雜誌往往騰出許多篇幅，用來介紹諸外國特別是中國學界的狀況。

除此之外，或可說是所謂「講壇歷史學」根據地的東大，在其號稱具有這項傳統的『史學雜誌』，到了這個時期，也陸續揭載了許多帶有馬克斯主義傾向的論文。然而，如此在各方面都已紛然呈現的史學革新動向，卻又因爲日本軍國主義日趨激烈化的侵略戰爭，而難免不會蒙受重大的影響。例如前面提到的『歷史學研究』，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不得已被迫停刊，而馬克斯主義色彩比較淡薄的『東洋史研究』，則勉強能夠持續刊行，雖然其所收載的論文，未必是一味地迎合侵略戰爭，但就整體而言，當時學術研究的自由受到相當壓抑，卻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綜觀當時日本全國的學界，其學術研究自由普遍被壓抑封殺，固然是事實，而在另一方面，卻也仍有不少人士昧著學術良知，從事迎合侵略戰爭政策的學問事業，甚至其中還包括了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要之，處於當時極其兇暴的軍國主義的思想鎮壓之下，即使有意貫徹不與戰爭妥協的立場，而繼續從事純粹自由的學術研究，幾乎是接近不可能的狀態。換句話說，日本學界的這段往事，在稍具良心的知識分子心中，實已留下了永遠無法抹去的歷史污點。

五、戰後的中國史重建與新時代區分說的形成

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戰敗投降，以及緊接著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對於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者而言，實都給與重大的衝擊，因爲這兩項事件，使得戰前一向認爲日本社會優於中國社會的信念徹底崩潰了。於是，日本學界的中國史研究者，面對這個無可爭辯的事實，勢非另行重建中國史的新體系不可。

最早著手進行這項工作的，便是一九四六年重新整建起來的「歷史學研究會」。在戰爭期間，曾有一部分日本的歷史學界，把中國史的發展看作是「停滯」的歷史，並把日本史的發展看作是「進步」的歷史，因而提倡後者較諸前者具有相

對優勢的說法；而今重整後的歷史學研究會的成員，顯然對此懷著強烈批判與反省的心境，進而試圖把中國史當作是一直進步的歷史來重新理解。於是，這時已經解除禁制而再度開始普及的馬克斯主義歷史論，也就是所謂的唯物史觀，便被他們採用作為主要的方法，致力於此項課題的研究。

欲將中國史看作是進步的歷史來處理時，其相關問題的焦點，勢必就集中於時代區分的方法。戰後最早發表有關時代區分問題之新見解的，是東京大學出身的前田直典，他主張中國在唐代以前是所謂「奴隸制社會」，也就是「古代社會」，因而反對內藤湖南以來的「京都學派」把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作為「中世社會」（相當於歐洲的封建社會）的說法（註一九）。接著，歷史學研究會採納前田氏的論說，並且奉為該團體的基本方針，於是逐漸奠定了「唐代以前為古代奴隸制社會，宋代以後為中世封建社會」的新時代區分說的基礎（註二〇）。

其後，把上述「古代奴隸制社會說」予以推進的是西嶋定生。根據他的論點，認為中國自春秋戰國以後出現的豪族勢力，是以家族奴隸的方式蓄養奴婢，並進一步擴充勢力及於周邊的共同體農民而讓其佃耕的大土地所有者；同時，他認為這種由奴婢及佃農組成的複合體構造，與希臘、羅馬的古典奴隸制有所區別，特稱之為「中國型奴隸制」。又根據西嶋氏的論述，認為自秦漢以至隋唐，仍是由這「中國型奴隸制」領導社會的生產方式，因而所謂均田制也被賦與「中國型奴隸制」的性格（註二一）。

至於主張宋代以後是「中世封建社會」的說法，則是根據周藤吉之關於佃戶制的研究。周藤氏認為自唐代中期以後盛行的佃戶制，是由於地主與佃戶間之身分制的關係而成立，並以此為具有農奴制的性格（註二二）。根據這項研究，仁井田陞、堀敏一等便認為自宋代以後展開了中國的中世封建社會，仁井田氏主要從法制史方面（註二三），堀氏主要則從唐宋間的政治過程方面（註二四），分別論述這種觀點。

如是，所謂「自殷周至隋唐為古代奴隸制社會，自宋至清為中世封建社會，自民國以後為近代社會」的新時代區分說於焉形成。對於形成這種新學說而達成重要任務的人們，清一色地全是東大出身的學者，其中大部分又都是在東大任職的教授。事實上，此說體系的孕成，是在針對內藤湖南所論時代區分法之批判意識上建立起來的。以下試列舉兩者的主要相異點：

首先，以時代區分所採的方法而言，內藤湖南是基於中國文化自然成長發展的觀點，來從事時代的區分；但「新時代區分說」卻是根據當時倡行的世界共同的生產方式，而採用發展階段說。其次，前者在秦漢與魏晉南北朝兩個時代之間，看到自古代（上古）轉向中世的時代變化；但後者卻把唐代以前一貫地視之為古代。再次，前者稱宋代以後為近世，並把它看作是近代社會的先驅階段；但後者卻認為那是中世封建社會，並強烈意識到歐洲列強於清末給與中國的衝擊。

「新時代區分說」約在一九五〇年代已經大致形成，但是不久即面臨嚴重的考驗。首先，此說遭遇的第一項困難，便是學界針對西嶋氏的「奴隸制說」展開猛烈的批判。約而言之，主要的批判焦點有二：（一）中國自春秋戰國以後，自耕農民已經成為社會的基本成員，實在難以將奴婢和佃農視為基本的勞動力；（二）所謂奴隸制的概念，原是從歐洲史中導引出來的範疇，率爾以之適用於中國史而論其歷史發展，在方法上並不恰當。於此不妨稍作進一步的補充說明，提出第（一）項批判的學者，是戰前擔任過東大助教授的濱口重國，他撰有『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卷、下卷』與『唐王朝の賤人制度』兩種卓越的名著（註二五），而其上述對西嶋氏觀點予以批判的論文收集在後者；又提出第（二）項批判的學者，則是一橋大學出身的增淵龍夫，他在戰後馬克斯主義的階級史觀風靡學界之際，曾把馬斯韋伯的社會理論採入以從事中國史研究，給與學界重大刺激，他指出秦漢時代的集團，例如游侠集團，其「長」與「成員」間的關係，雖是片面的「家父長的支配」關係，但那種關係是基於對成員之長的歸依心情而支撐的，因而單只以上對下的階級關係來立論是無法理解的，於是他根據這種觀點來批判西嶋氏的奴隸制說，他的各種論文均收載於所著『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秦漢帝國成立過程の社會史的研究——』一書中（註二六）。

這樣一來，西嶋氏不得不承認上述學界批判的正確性，終於放棄了原來的「奴隸制說」，並且隨即進行學說的重建。根據他再度提出來的的新說，認為秦漢帝國的基本階級關係，可以說是皇帝權力與自耕農民間的支配關係，而皇帝權是直接對農民的每一個人作人身的支配，並無任何他物介於兩者之間，他把這種方式的支配關係，特稱之為「一個人身的支配」。雖然「一個人身的支配」不是奴隸制，但那些農民也並非完全的自由民，因為其自耕農民的地位是藉由皇帝權力而獲得保障的緣故；然而，他們又不是國家的農奴，因為皇帝權對他們的支配，並非以土地做媒介，而是直接支配其人身的緣故（註二七）。

於此，不妨試加一項推測：西嶋氏重建的新說，似乎是把殷周時代視為馬克斯所謂「總體性奴隸制」（也就是「前資本主義生產形態」）的時代，並且認為歷經春秋戰國的變動之後，便逐漸轉移到藉由中央集權之專制國家的「個別人身的支配」。

西嶋氏主張這種「個別人身的支配」於唐代以前繼續維持，而堀敏一也支持此說。堀氏雖然承認自漢至魏晉期間，曾因大土地所有的發展，而使「個別人身的支配」呈現稍有倒退迹象的事實，但是以北魏的施行均田制為契機，又使「個別人身的支配」再度被重建且予強化，至隋唐帝國而臻於完成（註二八）。如此一來，西嶋氏當初所倡的「奴隸制說」雖被迫放棄，但因轉換成所謂「個別人身的支配」的新見解，致使其唐代以前為「古代」的時代區分說，卻依然持續以至於現在。

其次，「新時代區分說」遭遇的第二項困難，便是宋代以後為中世封建社會說之受到質疑的問題。蓋其主張封建社會說的根據，在於所謂佃戶制就是農奴制生產關係的這項認知上，可是，對於這項認知給與嚴厲批判的，則是京都大學教授宮崎市定先生。宮崎氏是內藤湖南的門下弟子，他對於中國史自古代到近代幾乎涵蓋所有時代的研究，都在於闡揚「內藤史學」的論說，並且發表了許多卓越可觀的研究業績（註二九）。關於佃戶制的研究方面，宮崎氏排斥所謂農奴制說，而將其視為近世的佃耕制，也就是說，地主與佃戶之間，並不存在有所謂人格的身分關係，兩者的結合，基本上是屬於一種契約關係的性質（註三〇）。當然，這樣一來，便難免與周藤吉之等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論戰，也同時出現了不少支持宮崎說的學者。

事實上，對於戰後形成的「新時代區分說」，在其他論點方面還不時出現有各種的批判，顯然未能獲得全體學界的支特，直到今日也是如此。儘管現在流行著各式各樣的時代區分說，但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仍要算是上述西嶋定生等主張的「新時代區分說」，以及自內藤湖南以來「京都學派」學者一直秉持的時代區分說。要之，在目前日本的學界裡，這兩種時代區分說同時存在，並且是維持在平行線的對立狀態，因而對於中國史的研究往往呈現兩種不同的主要看法，這種現象，也意味著日本的東洋史學界迄今仍然未能統一（註三一）。

六、結 論

前面已就近代日本對於中國史的研究，試作系統的論述，於此我們可以獲致如次的幾點認識：

首先，就日本東洋史學的成立及其演進而言。日本自古以來，即深受中國文化的薰陶與影響，因而一向重視有關中國歷史的知識與研究。明治時期以降，隨著日本近代國家的確立，也相繼創設近代學制的大學，其中設有所謂「東洋史學」的學科，專門研究以中國為中心之東洋諸國的歷史文化。唯因受到時代環境以及國情發展的影響，當時的東洋史學研究，往往是為了配合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政策的要求，爰是之故，諸如「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或「清國行政法」等皇皇鉅著，固然具有極高的學術水準和參考價值，但也無可諱言的，都是在如此時代背景之下編纂完成的產物。

其次，就兩次大戰期間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趨勢而言。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特別注重與民衆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經濟史方面的研究。於是，一批以東京大學出身的年輕研究者為中心，成立了一「歷史學研究會」，並發行刊物「歷史學研究」；而另一批在京都大學深造的年輕研究者，也組織了「東洋史研究會」，並發行刊物「東洋史研究」。這兩種學術性期刊雜誌所收載的論文，都是傾向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專論，並且致力於內外學界動態的介紹與批評。不過，就當時整體研究趨勢言，由於日本軍國主義強行對外侵略的政策，致使學術研究的自由受到壓抑，尤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對於思想的鎮壓更趨嚴厲，甚至迫使「歷史學研究」不得已停刊，因而學界要想貫徹不與侵略戰爭妥協的立場，幾近無此可能，無疑在當時稍具學術良知的知識分子心中留下了污點。

再次，就近代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相關主要課題的時代區分論而言。先是，京大東洋史學的開山祖師內藤湖南，基於他所獨創的文化史觀，打破向來幾乎純以王朝興亡為標準所作的時代區分，改而分析中國史內部底流的諸端現象來從事時代區分，提出了「宋代近世說」的觀念，進而形成所謂「內藤史學」的核心，也是「京都學派」學者所一直秉持師承的準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受到日本戰敗投降的重大衝擊，日本學界亟思重建中國史的新體系。於是，東大出身的學者前田直典，發表了有關中國史時代分期問題的新見解，他反對內藤氏等把魏晉至隋唐作為「中世社會」的論點，而提出唐

代以前是所謂「古代奴隸制社會」的說法；其後，此說歷經西嶋定生等學者的闡揚推進，終於形成所謂「自殷周至隋唐爲古代奴隸制社會，自宋至清爲中世封建社會，自民國以後爲近代社會」的新時代區分說。可是，這項「新時代區分說」隨即面臨嚴重考驗，相繼遭致濱口重國、增淵龍夫、宮崎市定等學者的猛烈批判，迫使西嶋氏不得不放棄原來所倡「奴隸制」的舊說，改而轉換成所謂「個別人身的支配」的新見解，卻又仍然堅持其唐代以前爲「古代」的主張。因此，在目前日本的東洋史學界裡，其有關探討時代分期的課題，實以西嶋氏等主張的「新時代區分說」與內藤氏等「京都學派」學者所秉持的時代區分說爲兩大主流，兩者對立並存，迄未合流統一。

總而言之，由於地緣因素以及文化背景的臍帶關係，日本對於中國史的研究，素來積極熱衷，更何況日本學者從事的史學研究，充分表現出「治學嚴謹務實，求知鍥而不捨」（註三二）的精神，因而長期以來累積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並且深受國際學術界的重視，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註三三），我們爲了避免故步自封或囿於己見，對其實況與動向，自應隨時加以留意並瞭解，俾能廣收切磋參酌的效果。

註釋

註一：詳參拙稿「淺談日本學界對中國史的研究」一文（『史學會刊』第十期，頁五至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會，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註二：例如根據北宋版刊行的宮內廳書陵部本『通典』、『貞觀政要』，以及根據明版刊行的近衛本『大唐六典』等書便是。

註三：所謂「五山文學」，是指自鎌倉末期經南北朝以至於室町時代（一三三六—一五七三年），於京都五山和鎌倉五山的禪僧之間盛行的漢詩文學。至於所謂「京都五山」，是由室町幕府所指定的京都五座禪寺，初爲南禪、天龍、建仁、東福、萬壽等五寺；後因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建立了相國寺，遂改爲天龍、相國、建仁、東福、萬壽等五寺，而南禪寺則躍昇爲五山之上的地位。又所謂「鎌倉五山」，也是由室町幕府所指定的鎌倉五座禪寺，即建長、圓覺、壽福、淨智、淨妙等五寺。

註四：所謂「抄物」，是指室町時代之禪僧以日式漢字體文字加註譯解的中國古典書籍。

註五：按東京大學是日本最早的官立大學，創設於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到了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根據「帝國大學令」而予以改組，綜合其所屬的法、醫、工、文、理等各分科大學和大學院，易名為帝國大學，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因京都帝國大學的新設而改稱東京帝國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學制的改革，於一九四七年（昭和二十二年）除去「帝國」二字而稱東京大學，兩年之後再改編成為新制大學。

註六：利斯是德國史學大師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學生，畢業於柏林大學，主修英國中世史。

註七：所謂「東洋史」一詞，在中國學界往往是指日本史，在韓國通常又是指中國史和日本史，其實都是沿用日本式的概念而言的。

註八：那珂通世（一八五一—一九〇八），可稱為日本東洋史學的開拓者之一，歷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一高等校的教授，曾以漢文撰著「支那通史」，又以日文翻譯蒙古語的「元朝秘史」而刊行不朽名著「成吉思汗實錄」，此外還校訂出版「元史譯文證補」、「崔東壁先生遺書」等書。（參閱「那珂通世遺書」所收、三宅米吉「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君傳」）。

註九：所謂「華族」，係指第二次大戰以前擁有爵位的人及其家族。原來，依照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頒布的「華族令」，除了舊有的公卿諸侯之外，對那些有功於國家的文武大臣或政治家、實業家等，也都授與爵位而擁有特權，通稱為華族。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於一九四七年（昭和二十二年）制定了現行的「日本國憲法」，規定廢除華族制度，同時也禁止類似制度的出現。

註一〇：有關白鳥庫吉的研究成果，可參閱「白鳥庫吉全集」全十卷（岩波書店刊行，一九六九—七一年）。

註一一：有關內藤虎次郎的詳細生平事蹟，可參閱三田村泰助著「內藤湖南」（「中公新書」二七八，中央公論社，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行）、千葉三郎著「內藤湖南とその時代」（國書刊行會，一九八六十二月五日發行）等書。

註一二：以上桑原氏的著書，後來皆收入「桑原鷺藏全集」全五卷、別卷一（岩波書店，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月發行）。

註一三：參閱註一一所列著書。

註一四：詳參內藤虎次郎撰「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原載於「歷史と地理」第九卷第五號，一九二二年五月發行；現收於「內藤湖南全集」第八卷「東洋文化史研究」，筑摩書房，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日發行）。

註一五：內藤氏對於辛亥革命以後民國成立初期之混沌政局的看法，可參閱氏著「支那論」一書（原於一九一四年刊行，現收於前揭「內藤湖南全集」第五卷）。

註一六：內藤虎次郎的這種時代區分論，是所謂「內藤史學」的中心，當他在京都大學授課時就早已講述過，但其成爲自己的論著公諸於世，而使人理解其論說的全貌，卻是在他去世後由稻葉君山氏所整理出版的講義『支那上古史』（弘文堂，一九四四年五月）、『中國中古の文化』（原題『支那中古の文化』，弘文堂，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國近世史』（原題『支那近世史』，弘文堂，一九四七年四月）等三冊概論性的著書。後來，此三書又都收於『內藤湖南全集』第十卷（筑摩書房，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發行）。

註一七：關於內藤虎次郎的所有研究論著，全都收載於他身歿之後由門生弟子整理編集的『內藤湖南全集』全十四卷（筑摩書房刊行，一九六九—七六年）。

註一八：那波利貞關於唐代之庶民社會史的諸研究論著，在他身歿之後，由其京大的門生弟子田村實造等，將其遺稿整理編集完成『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一書（創文社，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一刷發行）。

註一九：有關前田直典的時代區分說，詳參氏著『東アジアに於ける古代の終末』一文（原發表於『歴史』一卷四號，一九四八年；後收入鈴木俊、西嶋定生編『中國史の時代區分』「附篇」，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初版；又收入氏著『元朝史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七三年三月）。

註二〇：參閱宮崎市定著『中國史』上「總論」「二、時代區分論」（『岩波全書』二九五，岩波書店，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一刷發行；另有邱添生譯中文本，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元月初版）。

註二一：參閱西嶋定生「中國古代社會の構造的特質に關する問題點——中國史の時代區分論爭に寄せて——」（收入前掲鈴木俊、西嶋定生編『中國史の時代區分』，頁一七五至二〇八）。

註二二：參閱周藤吉之著『中國土地制度研究』一書（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五四年初版，一九六五年再版）。

註二三：參閱仁井田陞著『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一書（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一九六二年初版，一九八〇年補訂發行）。

註二四：參閱堀敏一「戰後日本の中國史研究における時代區分問題の現段階」一文（『歴史評論』一〇一號—一〇三號，歷史科學協議會編，一九五九年）。

註二五：濱口重國的两部名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卷、下卷』（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月初版，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第

二刷)；『唐王朝の賤人制度』(『東洋史研究叢刊』之十五，京都大學文學部內東洋史研究會，一九六六年發行)。

註二六：增淵龍夫『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秦漢帝國成立過程の社會史的研究——』(弘文堂，一九六〇年出版發行)。

註二七：參閱西嶋定生著『中國古代帝國の形成と構造——二十等爵の研究——』一書(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六一年三月發行)。

註二八：參閱堀敏一著『均田制の研究』一書(岩波書店，一九七五年九月發行)。

註二九：有關宮崎市定先生的介紹，可參閱溝上瑛『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宮崎市定さん——獨步行愛する「京都學派」長老——』一文(『アエラ』)，第二卷第十一號，「現代の肖像」，頁四九至五三，朝日新聞社，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四日發行)。

註三〇：參閱宮崎市定『部曲から佃戸へ——唐宋間社會變革の一面——』一文(原載於『東洋史研究』第二十九卷第四號、第三十卷第一號，京都大學文學部內東洋史研究會，一九七一年三月、六月發行；後收入『宮崎市定アジア史論考』中卷，頁二六四至三三八，朝日新聞社，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一刷發行)。

註三一：詳參谷川道雄『中國史の時代區分問題をめぐって——現時點からの省察——』一文(『中國中世の探求——歴史と人間——』所收，頁一九七至二二〇，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一九八七年九月十日第一刷發行)。

註三二：高明士著『戰後日本の中國史研究』「自序」語，頁二(東昇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初版)。

註三三：『詩經』「小雅」「鶴鳴」語。

註三四：『詩經』「小雅」「鶴鳴」語。

註三五：『詩經』「小雅」「鶴鳴」語。

註三六：『詩經』「小雅」「鶴鳴」語。